

云冈石窟选址研究

范鸿武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超越红尘的佛教石窟寺之选址与世俗的民居建筑、广场、车站等之选址肯定不同。佛教石窟寺的选址与复杂的社会原因、神秘的佛教教理、佛教传奇、石窟寺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人文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从佛教原理、宗教修行、中国风水文化、自然地理、地质、环境、交通等等因素以及历史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选址做综合性的研究是必要的。通过选址研究, 我们可对云冈石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研究云冈石窟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可较为准确地理解佛教石窟寺造像的背景及环境成因, 有助于扩展中国石窟艺术史研究的领域, 有助于深化佛教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云冈石窟; 选址; 佛教石窟寺; 佛教文化; 综合性的研究

佛教建筑、佛教石窟寺的选址是一门大学问。

超越红尘的佛教建筑、佛教石窟寺之选址与世俗的民居建筑、广场、车站等之选址肯定不同, 目的肯定不同, 功能也肯定不同。总体上讲, 佛教建筑、佛教石窟寺之选址服从于其宗教性质。

佛教石窟寺的选址与复杂的社会原因、神秘的佛教教理、佛教传奇、石窟寺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人文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北魏在398年定都平城后, 首先在平城倡导弘扬佛法, 开国皇帝拓跋珪和北魏佛教的领袖和高僧们对佛经的要求、标准和佛的活动场所、建筑等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是严格照搬印度佛教的遗址和标准而在首都平城筛选佛事活动地点, 设计构建佛寺、佛塔、讲堂、禅堂等建筑的。《魏书·释老志》有这方面的文字记录。

《魏书·释老志》开二十四史之先河, 书中单录北魏佛教、道教之史实与佛教、道教遗迹为一卷宗, 属于我国史学的开创性研究, 给学术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依据。其中记录云冈石窟的资料高度概括、粗略。

《魏书·释老志》记载: “天兴元年(398), 下诏曰: ‘夫佛法之兴, 其来远矣。济益之功, 冥及存没, 神踪遗规, 信可依凭。其敕有司, 于京城建饰容范, 修整宫舍, 令信向之徒, 有所居止。’是岁, 始作五级佛图、耆闍崛山及须弥山殿, 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 莫不严具焉。”

以上所引之文字, 字数不多, 内涵却相当丰富。

内容大体上合并起来为三类: 第一类是讲皇帝下诏书倡导佛法的理由、目的。第二类是讲398年在国都平城弘扬佛法所做的几件佛事: 修建五级佛塔、耆闍崛山和须弥山殿, 又修建了讲堂、禅堂和沙门座。第三类是讲六大建筑僧舍都是依照佛典的严格要求, 模仿印度的佛迹, 实地勘测设计操办的。

我国学者辛长青先生经研究认为: 云冈石窟是耆闍崛山。他并认为: 对“耆闍崛山”的确定, 是依照印度“灵鹫山”的标准精心筛选的。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辛长青

先生以上这一学术观点。

关于佛教石窟建筑的选址, 除了复杂的宗教原因和社会原因、深刻的佛教教理之外, 令人信服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古代人选择地理环境位置的智慧。

古人开凿石窟必须先勘石质, 看风水, 观山势, 察水脉。

中国现存的1000余石窟, 都是选址靠山临水的最佳位置。著名的敦煌莫高窟, 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 下临党河(水)。洛阳龙门石窟, 开凿于龙门山、香山, 下临伊水(河)。大同云冈石窟开凿于武州川峡谷北岸, 北倚山崖, 下临十里河。

云冈石窟的选址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云冈石窟的选址与逐渐形成的布局, 体现出依附自然山水, 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布局特征。云冈石窟的开凿, 与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特殊的地理位置、石窟寺所在地的人文历史积淀、与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都平城(山西大同市)距离的远近、理想的“风水”胜地、石质的地质学特性、朝向、交通、经济条件等等因素。云冈石窟的选址, 符合佛教徒修禅及僧俗信徒拜佛以修功德的特定环境要求,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传统风水观的选址理念相吻合。

为什么选择武州山以开凿石窟佛造像, 云冈石窟的选址基于哪些因素和条件? 云冈石窟与周围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分析起来, 大致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1、云冈石窟开凿的地点选择, 与佛教徒修禅有着必然的关系

石窟寺是印度佛教的产物, 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与一般寺院没有多大区别。石窟, 就是开凿于山石、崖壁间的洞室, 最初是佛教的修行之地, 佛教术语叫“僧伽蓝”。为什么要把修行之所安在石崖壁间呢? 在学者给出的理由中, 有两条至为重要的宇宙中心是须弥山的信仰, 神都住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1763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1月。

《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一), 辛长青《云冈石窟与耆闍崛山》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一), 辛长青《云冈石窟与耆闍崛山》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作者简介: 范鸿武(1968-), 男,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设计艺术学。

在山上。因此,开窟于山,修行于窟就有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山崖从物质形式本身就有两层意味:一是区别于世俗生活的隐世。二是显示了隐世苦修的决心。

佛教石窟寺一般开凿在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地方,其开凿的目的与佛教徒的修禅、修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域记》云:“唐言帝释窟。西峰南岩间,有大石室。广而不高,佛常中止。……其迹犹在。”也就是说悉达多成佛后,就有住仙山、行居石窟的活动和行为。佛祖住仙山、行居石窟的活动为崇拜佛祖的佛教徒们提供了修行的榜样,行居石窟的行为是为了禅修、修行。

东晋佛陀跋陀翻译的《观佛三昧海经》说:“世尊欲令人众见佛色身……百千龕窟,于诸龕窟影现诸佛与佛无异。”很清楚开凿石窟就等于观拜佛像。观拜佛像与修禅、修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僧法显写的《佛国记》说得非常明白:“入谷,博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头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雕鹫,住窟前恐阿难。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南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存。故曰雕鹫窟山。”种种资料说明:佛、禅、石窟是密不可分。

佛教石窟寺开凿的地点选择,与佛教徒修禅有着必然的关系,修行者需要在环境清静之处进行禅思,因此要选择远离城市喧嚣、幽静山林,水边崖际之处。佛经《禅秘要法经》中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付法藏因缘传》中亦明确指出:“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龕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中国古代石窟寺的开凿,也基本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禅定是佛教徒的一种修行方式,进行禅思时,需要安静的环境。在僻静的山林和河畔山崖间开凿石窟坐禅是符合禅修需要的。

云冈石窟的所在地——武周山远离城市喧嚣、幽静,有山林、河川。云冈石窟的选址,既符合佛教徒修禅及僧俗信徒拜佛以修功德的特定环境要求,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传统风水观的选址理念。

2、具备一定的人文历史沿革的武州山是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

之所以选择武州山,作为石窟开凿的地点,是因为武州山是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其具备一定的人文历史沿革。云冈北魏时期称为武州山,云冈石窟原名武周山石窟,武周山是北魏进入平城以后祈福、祭祀的地方。北魏早期,武州山即被奉为神山。武州山是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云冈北魏时期称为武州山,北魏早期即被奉为神山。

武周山是皇帝祈福的神山。明元帝拓跋嗣曾多次到武州山祈祷,并封该山为“常祀”之地。

《魏书·礼志》记载:“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祉。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武州山与北魏皇帝有深厚的

因缘。武州山对于北魏王朝的意义是重大的。武州山在北魏王朝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武当山在大明王朝的地位。

太宗明元帝到此山和车轮山祈祷,顺利登上了皇位。孝文帝在此山祈雨,“俄而沛雨大洽”。此山确实是灵山,名不虚传。

后来,逐渐成为北魏皇帝祈雨、开窟、礼佛的“鹿苑”胜地。

自明元帝以来,北魏皇帝曾七次到武州山祈雨、拜佛,遥祭祖宗。早在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开凿之前,北魏第一任“道人统”(北魏早期统管全国僧务的最高僧官)法果和许多僧人常住于此。武州山逐渐成为北魏王室祈福的神山,并很快地成了京都佛教圣地。武周山是皇帝祈福的神山,因而将石窟选择于此。

3、云冈石窟选址与云冈盆地四周群山环绕的特殊地理位置相关

云冈石窟位于云冈盆地。云冈盆地四周群山环绕。云冈石窟开凿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十六公里的武州山南麓。云冈石窟的山川地貌、自然风光和恢弘气势、壮观景象古今闻名于世。从现状看,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名十里河)峡谷的北岸。东西绵延1公里。石窟坐北朝南,依山面水,十里河在南面流过。云冈石窟位于云冈盆地。云冈盆地四周群山环绕。这里不仅与世俗生活隔离相对较远,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十里河的存在和靠山临水的山水地貌形成了一派清幽的大自然风光。

4、大同在古时重要的都城地位及北魏皇帝奉行笃信佛教的国策

如果北魏政权定都不在平城,大规模开凿平城附近的云冈石窟可能不会发生。

大同,古称平城,地处晋、冀、内蒙三省(区)交之要冲,介于内外长城之间,背靠蒙古高原,遥望晋阳大地,有“北方锁钥”之称。此地“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进有所托,守有屏障,地理位置险要,自古属于边塞用武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实为进入中原地区的北大门。经道武帝拓跋珪卓越的创业和经营,力行人主中原的意图,攻克后燕都城中山后,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自盛乐遥都平城,定国号为魏,改称皇帝;“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建立永久性都城。从398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迁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帝国统治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398年至494年,平城建都九十七年,平城的国都地位达近一个世纪之久,平城是当时欧亚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型大都会。北魏定都平城与云冈石窟的开凿,的确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魏皇帝笃信佛教,奉行笃信佛教的国策,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原因。北魏皇帝奉行笃信佛教的国策与云冈石窟的开凿,有着内在的联系。

5、武州山与都城平城之间的特殊地理关系

武州山与都城平城距离不远,只有十几公里。选择武州山,作为石窟开凿的地点,不仅因其具备一定的人文历史沿革,同样也因有着不可或缺的环境特征,而成为大同周边唯一可首选的佛教石窟寺胜地。

云冈山谷是通往内蒙古内地的重要通道,古时具有军事意义的武州塞就在武州山附近,可见当时武州山的地理位置已相当重要。由此可知,武州山由于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理方位,与都城平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6、山水胜景的独特魅力

武州山不仅由于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理方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又因其山水胜景,闻名于世。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水》中曾这样描述了云冈石窟:“武周川水又东流,水侧有石,只垣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道宣《续高僧传·释昙曜传》中亦记曰:“去恒安(大同)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人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以上文献不仅记述了云冈石窟的山川地貌、自然风光和恢弘气势、壮观景象,同时也反映了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

北魏早期,云冈石窟即被奉为神山。武州山是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明元帝拓跋嗣曾多次到武州山祈祷,并封该山为“常祀”之地。据《魏书·礼志》记载,明元帝拓跋嗣做太子时,“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后来,逐渐成为北魏皇帝祈雨、开窟、礼佛的“鹿苑”胜地。

自明元帝以来,北魏皇帝曾七次到武州山祈雨、拜佛,遥祭祖宗。武州山逐渐成为北魏王室祈福的神山,并很快地成了京都佛教圣地。因此,云冈石窟的开凿也就理所当然地选址在武州山。

7、符合传统“风水”的选址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讲,云冈石窟之选址也与中国传统“风水”学的选址理念相吻合。

按照传统“风水”学的观点,云冈石窟具备了中国传统“风水”学选址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村落宅第以及墓葬选址,均依照“风水”观进行。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在带来外域文化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中原本土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原本土文化的造像风格及建筑方式。建造佛寺庙宇,更是要选择自然环境中的“风水宝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而得水最佳之处,首先要选择水口。《青乌经》云:“水口宜山川融结,峙流不绝。”《葬经翼·水口篇》更加认为“水口乃地之门户”的重要性。云冈石窟得武周川之水,云冈石窟正确选择了水口,武周川处于北方的武周山和南方的南山之间,水流不绝,正是符合了

传统风水学“藏风得水”的原则。云冈石窟,开凿于武州川峡谷北岸,北倚山崖,下临深川。坐北朝南,背山面水,武周川(十里河)水东流,水侧有石。十里河位于云冈石窟景区的南方,在附近流过。

武周川流于四面环山的云冈盆地,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川(今名十里河)峡谷的北岸,可谓得水最佳之处。云冈石窟环境不仅有得水的选择,同时又基本体现了“负阴抱阳”及“背山面水”的选址理念。武州山,基本呈东西走向,但石窟地点选择之处,位于武州山南麓,方向朝南,背山面水。这样就达到了既“得水”,又“藏风”的最佳环境。

8、与北魏都城连接的合适距离

武州山水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同时,也有与北魏都城平城距离适当的客观因素,致使武州山成为佛教石窟寺的首选之处。北魏都城平城(大同市)四面环山。就周围远近不同的山脉而言,平城周围分布有大小不同的山脉,其距离都城平城远近不一。武州山云冈石窟距北魏都城平城的距离相对较近,两地之间只有大约16公里的距离。云冈石窟处在与都城平城距离既不太近又不太远的地理位置。云冈石窟与都城平城之间的距离是适当的。

9、地质因素及石质的特性

地质因素对石窟开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云冈石窟的岩石性质属于侏罗纪云冈统透镜体砂岩,云冈石窟的岩性变化不大,它具有整体岩石的硬度,这种岩石易于雕刻,石窟的开凿无需泥塑。石窟的加工与造像不需要借助于泥作。

云冈石窟的开凿,与武州山石质的特性有着内在的必然关系。武州山的地质构造基本属于侏罗纪厚层砂岩,岩石的主要成分为长石和石英。龙门石窟雕刻的造像,正如王子云先生所云:“由于龙门石窟是石灰岩,比较坚细,所以在雕像的制作上,较云冈更为精致。”

云冈石窟均雕凿在侏罗纪云冈统透镜体砂岩上。岩石成分主要为长石和石英。这层砂岩上部较坚硬,下部较疏松,宜于开凿。根据优越的地质条件,石窟雕刻大师巧妙地利用这层砂岩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精心安排窟室布局 and 雕像选形。凡是岩石坚固的地方,则精雕主件,凡是岩石较为疏松的地方,则雕以支、撑、坐、台等次要部件。而敦煌石窟的岩石性质属于砾岩,岩性变化大,它不具有整体岩石的硬度。而是以松散的陆相砾岩沉积在河流西岸,因此,经开凿的洞窟表面高低不平。由于卵石与砾岩的硬度、大小、密度都不一致,给表面处理加工带来了困难。所以敦煌石窟的加工与造像都借助于泥作,把石窟的开凿与泥塑、彩绘结合起来。

云冈石窟厚层砂岩佛造像与龙门石窟石灰岩佛造像在造型语言特征上不同,云冈石窟厚层砂岩佛造像与岩石性质属于砾岩的敦煌石窟佛造像在造型语言特征上也有不同,表明了地质因素和材质本身,对佛教雕塑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地质因素和石质对石窟开凿对雕塑的制约作用是客观存在、不容否定的。

10、朝向

在石窟选址中,朝向也曾普遍受到重视。根据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最好为南向和东向。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十六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名十里河)峡谷的北岸。石窟大门、入口均朝南。窟前地面开阔,目极远山。真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好地方。

11、交通线因素

石窟不仅选于自然山水之间,而且也往往在重要的交通线上。云冈石窟离都城平城不太远。在重要的交通线附近。

我们从佛教原理、宗教修行、中国风水文化、自然地理、地质、环境、交通等等因素对云冈石窟的选址做了综合性的研究。作为研究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云冈石窟的选址也很有必要。《魏书》等历史典籍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关于主持设计开凿云冈石窟的北魏时期最高的僧官——昙曜法师的历史信息。

云冈石窟的选址与北魏时期最高的僧官——沙门统昙曜法师密切相关。正是这位昙曜法师——北魏时期最高的僧官选址在武州山并设计开凿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位对音乐、绘画、雕塑、建筑都有很高的造诣的多才多艺的昙曜法师选择了处于武州川(今名十里河)的北岸的武州山,在近水的武州山之阳开凿云冈石窟。

昙曜,少年出家,身入空门学佛。在到山西平城之前,昙曜曾经在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修习禅业,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开凿石窟,与凉州有缘分。他在河西凉州地区就是著名高僧。

高僧昙曜与山西平城、河南洛阳、辽宁锦州义县等地也有缘分。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9月北魏灭北凉,掠宗室民户,十万迁北魏都城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下令灭佛杀僧,昙曜拒绝还俗遁匿山中。文成帝即位,下诏恢复佛教,昙曜被封为沙门统为统领全国佛教寺庙、僧众的最大的僧官。

高僧昙曜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皇帝即如来”的口号,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支持,振兴了中国北方的佛教。高僧昙曜法师又召集了天竺(印巴次大陆)入华僧人,集中在北魏都城——平城译经。高僧昙曜不仅是一位渊博的佛学学者,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对音乐、绘画、雕塑、建筑都有很高的造诣。

高僧昙曜法师设计开凿了云冈石窟,并将佛像与北魏五位帝王像融为一体,雕塑了著名的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应宣武帝元恪之邀开凿了洛阳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古阳洞。宾阳洞中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是昙曜法师的代表作品。昙曜法师晚年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应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的精诚邀请,远赴营州,帮助元景设计,开凿了辽宁锦州义县(营州河城)福山万佛堂石窟。

史实证明,高僧昙曜法师主持设计开凿的石窟不是只有云冈石窟一处。至今,在山西、河南、辽宁都留存他主持设计开凿的石窟供今人游览。总之,这位对音乐、绘画、雕塑、建筑都有很高的造诣的多才多艺的高人昙曜法师对开凿云冈石窟起了重要作用。昙曜法师这位历史上著名的高人,其聪明智慧对云冈石窟的选址和设计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12、小结——综合性的多学科多角度的选址研究之必要

以上我们从佛教原理、宗教修行、中国风水文化、自然地理、地质、环境、交通等等因素以及历史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选址做了综合性的研究。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可对云冈石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云冈石窟的选址与逐渐形成的布局,体现出依附自然山水,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布局特征,传统“风水”选址原则在云冈石窟也有一定的体现。

进一步深入研究石窟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较为准确地理解佛教石窟寺造像的背景及环境成因,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研究中国本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有助于扩展中国石窟艺术史研究的领域,有助于深化佛教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年8月
- [2]《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下卷),《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
- [3]《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2008年
- [4]《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一、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05年
- [5]《黄土上下》,张朋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 [6]《2005年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冈石窟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
- [7]《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 [8]《中国雕塑史》,梁思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 [9]《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李希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